

WENSHI ZHISHI



# 文史知识

正始玄风与正始文学思想

关于清初文化政策的思考

我国古代的井盐

古枕趣说

反切说略

诸葛「草庐」究竟在何处

罗果强

陈祖武

何珍如

王赛时

王一鸣

黎虎

1990

6



医药学院610 2 01410699

# 文史知识

1990年第6期

(总第108期)

• 治学之道·谈学术工作的基础 刘家和 3

• 文学史百题·正始玄风与正始文学思想 罗宗强 11

• 历史百题·关于清初文化政策的思考 陈祖武 19

|                  |                       |     |    |
|------------------|-----------------------|-----|----|
| 诗<br>文<br>欣<br>赏 | 一字之差 境界全非——重读杜牧的《秋夕》  | 臧克家 | 23 |
|                  | 析薪破理 辞约旨达——读司马光《训俭示康》 | 赵伯陶 | 25 |
|                  | 人生最贵是真情               |     |    |
|                  | ——郑板桥词《贺新郎·赠王一姐》赏析    | 董国炎 | 30 |
|                  | 生命意象的超越——苏曼殊《春雨》诗解析   | 邵迎武 | 33 |

• 古代科技漫话(35) •

我国古代的井盐

何珍如 37

|               |         |     |    |
|---------------|---------|-----|----|
| 文化<br>史<br>知识 | 古代熏香琐谈  | 张庆  | 42 |
|               | 古人的“郡望” | 曹之  | 47 |
|               | 古枕趣说    | 王赛时 | 50 |

• 宗教与人生·《道藏》与山西之翰墨因缘 师道刚 54

• 文史书目答问 •

《丛书集成初编》——一部完备而实用的古籍丛书 陈抗 61

|          |            |     |    |
|----------|------------|-----|----|
| 人物<br>春秋 | 崛起寒微的宋武帝刘裕 | 陶易  | 64 |
|          | 朱勔与花石纲     | 李晓  | 69 |
|          | 蜚声日本的朱之瑜   | 孙传钊 | 73 |

图书资料

|                                                                                                                                      |         |     |
|--------------------------------------------------------------------------------------------------------------------------------------|---------|-----|
| • 武侠小说漫谈 • 论侠意识                                                                                                                      | 刘新风     | 79  |
| • 古法丛谈 • 诸法合体                                                                                                                        | 梁治平     | 84  |
| 语言 反切说略                                                                                                                              | 王一鸣     | 88  |
| 知识 释“售”                                                                                                                              | 崔俊清     | 92  |
| • 古代心理诗学(1) •<br>寻找艺术情感的快适度<br>——“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新解                                                                                       | 童庆炳     | 93  |
| 山西古建筑及其壁画彩塑艺术                                                                                                                        | 柴泽俊     | 98  |
| 青年 也说“什伍”——兼与吴翼中同志商榷                                                                                                                 | 车新亭     | 103 |
| 园地 陶诗中的历史人物                                                                                                                          | 聂鸿飞     | 107 |
| • 文史信箱 • 诸葛“草庐”究竟在何处                                                                                                                 | 黎 虎     | 110 |
| • 文史古迹 • 唐晋斯源 文物精华——晋祠介绍                                                                                                             | 任志录     | 116 |
| • 文史研究动态 •<br>全国第二届赋学研讨会综述                                                                                                           | 田耕宇     | 120 |
| • 读者 • 作者 • 编者 •<br>也谈焦仲卿与刘兰芝悲剧的原因                                                                                                   | 潘朝禄 车光斌 | 123 |
| • 补白 11 则 • 著书如铸钱(10)宋人为邑(32)一祝不胜万诅(46)<br>我国古代的审计(53)竭池求珠(60)敬德有忠直之<br>誉(78)王叔和与《脉经》(91)《陋吏铭》(97)荆人畏<br>鬼(102)不以小恶忘大美(106)粤工操舟(127) |         |     |
| 《盐井图》(封二) 山西晋祠圣母殿(封三)                                                                                                                |         |     |



· 治学之道 ·

## 谈学术工作的基础

刘家和

刘家和，1928年生，江苏六合人。1952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美国《世界历史杂志》编委等。著有《印度早期佛教的种姓制度观》、《论黑劳士制度》、《〈书·梓材〉人历人宥试释》、《史学和经学》、《关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宗法辨疑》、《先秦儒家仁礼学说新探》等论文数十篇，主编有《世界上古史》，并有与人合作的著译多种。

在学生时期，我曾有志于治中国古史，并为此作了一点准备。毕业后，因工作需要，从事世界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多年。七十年代后期，又因工作需要，重新投身于中国古史的研究与教学，同时又走上了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道路。由于专业领域的变动与扩展，长期来曾遇到许多矛盾或难题，而其中经常出现的就是基础与研究之间的矛盾。我的实际经历是，只有不断克服基础方面的缺陷，才能稍稍缓解自己的学术困境，并有所前进。

首先谈谈个人对于学术工作的基础的层次问题的体会。

开始参加世界古代史教学辅导工作的时候，因为原先没有准备，而教学进度又限定了各部分的准备时间，所以只能以几本苏

联的和西方的古代史教科书为基本参考材料，少数有疑难的地方才查阅一些古代的国别史。由此开始对世界古代史有了一个总体轮廓的了解。有了这个初步基础，又参加编写讲义，分工写希腊史章节的初稿。一着手于这个工作，就又感到刚打的那点基础很不够用。于是，原来只是偶尔才看一下的两本希腊史变成了基本参考书，有疑难的时候还要去查阅有关专著并核对某些史料来源。这样，在希腊史方面的基础就稍稍有所加深。随后，正好又有两年的进修机会，使我有机会把世界古代史的一般基础打得更牢一些，同时也把原已酝酿近一年的一个研究题目（论黑劳士制度）在时间、精力较集中的条件下写成一篇约八万字的论文。从前写希腊史讲义时所打的那点基础，对于写论文是有益的，但又是很不够的。我不得不以格罗特《希腊史》中的斯巴达史部分和当时出版不久（1952年版）的两本斯巴达史作为基础性的参考书（因为它们不仅比较详细地提供了历史背景，而且对于史料和有关的史学研究成果也有所评介），同时从古典作家的著作里把有关史料尽可能完备地搜集起来。

从开始参加工作到写出上述论文，五年之间三次遇到基础不够的问题，而且每一次都是在从基础上作了一番努力之后才取得了一些进步。这种情况使我对于学术工作的基础问题产生了许多思考。先前我曾认为，只要年轻时打好基础，以后就是做研究了，不再存在打基础的问题。这时开始觉得原来的想法太简单了。诚然，年轻时可以打下一些知识基础（如语文工具等），以后永远有用，但决非永远够用。基础是相对于学术工作而言的。随着工作或研究层次的提高，势必要有相应的基础的加深。基础同样是有层次的，它的层次常因学术研究层次的变化而变化；反之也可以说，基础层次的变化为研究工作层次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所以，在一个人的学术老化阶段到来之前，总是会不断加深其基础的。

## 二

其次谈谈个人对于学术工作的基础的结构问题的体会。

在进修期间，我不仅意识到基础是有层次的，而且开始思考基础的结构问题。因为我逐渐发现，要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水平，还存在基础的结构方面的障碍。

就毕业论文的写作来说，如果要求学术水平有较大的提高，那在基础上至少还要有两个方面的拓展。一是语文工具方面，如果希望对史料本身具有考证的能力，那必须通晓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如果希望能直接阅读近代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那就要掌握三四种现代西方主要文字。当时自己虽然非常迫切地想在语言文字上有更多的进展，可是实际使用的基本仍只是英、俄两种现代文字。差距是很明显的，而且这个差距非短期所可弥补也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当时我写那个题目，十分需要与古代印度和中国的历史进行比较研究。黑劳士与印度的首陀罗的异同何在？这在国外学者中已有不少讨论。黑劳士问题同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纠葛，这更是国内史学界所共知的。要想真正弄清黑劳士问题，没有深入的比较研究肯定是不行的。当时我也尝试着做了一些比较的探索，可是在做的过程中，不仅痛感自己印度史方面基础的薄弱，而且还发现自己在中古史方面的基础也并非深厚。原来自以为对中国古史有基础，实际上那只是有一些最基本的准备；要形成一个真正扎实的学术基础，还需要有一个充实和调整的过程。所以，从宏观的角度看，差距也是明显的，而且这个差距非短期所可弥补。此前几年的经验告诉我，逐步缩小范围，逐渐提高研究层次，是可以取得较快进展的。不过，经验同样也告诉我，这样的层次提高是有一定限度的；没有对基础的拓宽及其结构的调整，就不可能有更多的研究层次的进展。

另外，就我的教学工作领域（世界古代史）来说，如果想要有总体上的水平提高，那末基础的结构也必须有所调整。在某个点上有一定程度的深入，在全课领域中有一个一般的基础，这的确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样开始出现了点与面的关系。点上水平的提高，有可能带动面上的发展；而面上的发展，也可以促进点上的提高。这种情况是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但的确明显地优于无重

点的平推。因为基础的完全平衡状态，实际上是一种不利于学业发展的局面。不过，我也意识到，相对于世界古代史这样一个宽阔而复杂的学术领域，仅仅毕业论文所在的点（希腊）还难以实现带动全面的作用。需要两三个文化类型不同的点，通过对它们的较深入的研究和对它们的比较，以提高自己对世界古代史总体把握的水平。

怎样选择这两三个点呢？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可是在外国人写的世界古代史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要改变祖国历史在世界史上的不合理地位，不能依赖别人，只有靠我们自己把中国史放进世界史中去研究。因此，在我从事世界古代史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从来没有间断过对中国古史的业余进修。中国古史实际上早已成为我的选点之一。另一个点，经过再三思考，选定为印度史。因为，印度也是文明古国之一，其文化自有特色，足资与中国及西方历史进行比较研究，而且是我们的邻国，很有研究的必要；同时，中国历史上有研究印度的传统，积有大量的汉文的关于印度的文献，如能恰当而充分地运用这一条件，我们的研究也很有作出自己的特色的可能。

选定印度史作为一个点以后，当然又要做打基础的工作。从总体来说，我必须在关于古代印度史的文献上下功夫。这种文献分为三大部分：一为古代西方人的撰述，二为古代印度人的典籍，三为古代中国人的撰述和大量汉译佛教经典。第一类文献，数量有限，近代西方学者已经作了不少工作，并有现代西文译本。在不具备对版本和文献本身作考据的条件和能力的情况下，可以借用近代西方人的成果。我决定这样做，所以难度不大。第二类文献，数量大，充满教派的分歧，成书年代漫长而不易确定，文字又很艰深复杂，可能是难度极大。不过上一世纪和本世纪的一些西方学者和印度学者已经作了很多很有效的工作，不少重要文献已有现代西文译本（甚至不止一种译本），有些还有相当详细的学术性注释，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在细考文献的基础上写成的学术著作。所以，实际的情况是，入门不难，掌握到一定程度（比较

充分地运用人家的已有成果)也并非很难,而升堂入室(具有对文献本身的考证能力)则极难。当时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到第二个层次,待条件可能时再向第三层次试探前进。第三类文献是汉文《大藏经》,卷帙浩繁,内容复杂。如果只准备从某几种经里抄摘一些有用的史料,那还不算太难。可是,如果想使这类文献得到合理而充分的应用并用出一定的水平来,那就非常不易。我按照自己搞中国古代文献的经验,在掌握了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轮廓以后,就直接从目录学入手。《大藏经》的确像千门万户的迷宫,不过,古代高僧们已在分别二乘诸部、辨明歧出别本、考镜异译源流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给了我们不少方便。经过对大藏目录做了一番大体上的了解以后,我又根据自己研究的需要把它们分为三个部分,用不同方法对待。对大乘部分只求了解源流和分部的大体情况,基本上不深入经文;对目录和史传部分则选择其中重要者置于身边,作为不时反复翻检、查核之工具;对小乘,尤其其中经、律,则深入原文,注意比较别本、异译,必要处还与南传经英译本有关部分对读。经过约四年时间(其中重点搞目录的时间约两年半),打下了一个初步的也是有益的基础。在这个时期中,我已经比较明确地意识到基础的结构的重要性,注意使整体中的各个部分分别进展到不同的层次,并使它们能够相互呼应,相互配合。这种结构适应于当时我的研究需要,同时也不妨碍在研究主题变化时有对结构本身作调整的可能。合理的基础结构,应该既符合当时研究的需要,也具备为适应将来需要而调整的可能。

总之,基础的结构因研究目标而变,研究目标越明确、越自觉,基础的结构安排也会越合理。

### 三

最后,谈谈学术工作的基础中的博和精的关系问题,这是与基础的层次、结构密切有关的一个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基础层次的较低部分相对于较高部分来说是博,较高部分相对于较低部

分来说是精；基础结构的一般部分相对于核心部分来说是博，核心部分相对于一般部分来说是精。博与精是相对的，也是相辅相成的。对于这一点，我在攻大藏目录时已有所认识，而对于博与精的相互转化关系的认识，则是在一个更长的时期中逐渐达到的。

在我以世界古代史为主要工作对象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史只能是当作业余爱好来抓。当时我住在离西单商场不远的一条小胡同里，每天工作到黄昏时总不免有些疲乏，如无特殊事情，就到商场去逛旧书店约一小时，作为休息。一般总先看看外文书店，然后大部分时间在中文书店里。进书店后先是广泛地看看，边看边考验自己的目录知识，作为娱乐。对于眼生的书，每次挑一种，翻开看看序言、体例等项，回家后再查阅目录书，以作印证。如此日积月累，不了解的书逐渐减少，书目眼界日益展开。泛览之外，每次都要找自己关心的一两种先秦（有时也包括两汉）的书看看，凡有不同注疏者，都力求了解其各自的特点。这样做了几年以后，兴趣又逐渐集中到清代汉学家的著作上。每次到旧书店，总要了解一些他们的著作，只要见到他们的年谱之类，一般都要略看一遍，对其中一些有机会还会再仔细地看看。逛旧书店原是休息性的泛览，不过我还是把这大体分为求博和求精的两个部分。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十几年中不停地逛旧书店，本来并未认真当一回事，可是竟然为我以后研究中国古史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目录学知识基础，使我的研究有可能进入较深的层次。

也正是在阅读清代汉学家和晚近一些史学大师的著作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了精与博相互转化的内在关系。通常我们都把博看成精的外部条件，这固然不错。可是实际上，只有当各种有关的外部条件都被集中运用解决一定问题的时候，精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清儒自顾炎武以下，考据日精；也从他起，走的都是一条赖博以成精的道路。顾氏《日知录》内的文章，一般都不长，可是没有一条不是在博览前人著作以后才笔削而成的。清代许多学者都兼通多种学问，用以研治经史。清代汉学殿军孙诒让撰《周礼

正义》，为学术界公认的注释精品，而其所以精，则在于书中各方面的问题都得到相当充分的解析。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他博通多方面的学问并用以解决一部书中各种有关的问题。他的精就是他的博在这部书中的充分展开。看来是作为精的外部条件的博，恰恰转化成为其所以成为精的内在的有效因素。已故当代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考据之精，也是人所公认的。他每研究一个问题，总要首先从史料上做到“竭泽而渔”，然后又用其在校勘、年代、史讳等方面的学问去辨析史料的真伪，所以他的精也是将博集中用于一点的结果。诸如此类的实例，不胜枚举。我于前辈大师，未敢望其项背，不过觉得，只要认真体会并学习他们在处理博精关系上的学术路数，总是能不断有所前进的。多年以来，我读先秦两汉典籍，在紧要处或有疑难处，从不敢以得一家之解为满足，虽不能“竭泽而渔”，至少对主要的各家说法都要作认真的比较和思考，然后择善而从。平时这样逐渐地积累，到写文章时，虽未能言精，却可避免不少过于肤浅与无根的失误。

对于研治史学的人来说，非博难以成精。反之，非精亦难以成博。两千多年以前的庄子已经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到了文化更加发达的后世，个人更难掌握人类已有的一切知识。所以不论是多伟大的学者，他的博都必然是有各种各样的限度的。一个人到底怎样确定自己博览的范围和要求，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其学术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范围的博览，根本不可实现；范围过大，与自己的时间、精力等条件不相应，结果往往是宽而浅，自然没有成为基础的价值；甚至范围虽然大致适当，而对范围内的各部分不分轻重缓急而平均用力，结果则往往是多而杂，不能形成一个结构合理的博的基础。以上的情况，严格说来都不能算是博。当然这就涉及“博”字涵义问题。有人见到古来有“多闻曰博”的说法，便认为学者可以有一种广博而不精通的类型，即所谓“博而不精”。其实荀子说“多闻曰博”，还说“多而乱曰耗”（《荀子·修身》）。《说文》：“博，大、通也。”《玉篇》：“博，广也、通也。”不少人只注意到“多

闻曰博”，而忽视了“多而乱曰耗”（按耗的意思也是乱，特指多而乱）；只注意到博有大和广的意思，而忽略了它还有通的意思（王筠《说文句读》特别指出博有广、通二义）。所以真正的博应该是知识广而通。《论语·卫灵公》记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子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贯就是通，知识多而贯通，正是孔子的博。这样才是真正的博。而要能有真正的博，则非有明确的研究目的或求精方向不可。所以说，非精也难以成博。

总之，我认为，不把基础看成笼统的、凝固的东西，而注意其层次、结构的变化与博精之间的相反相成的关系，这会有利于基础质量的改善，从而也会有利于学术工作水平的提高。而学术水平的提高与学术能力的加强，又会使我们有可能更自觉、更有效地把以前积累的知识和经验融铸成新水平上的基础。前行阶段的学术成果和学术经验不断转化为下一阶段的基础，这也就是学术工作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

## 著书如铸钱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毁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乎！

——顾炎武《亭林文集·与人书》

〔译文〕我曾说现代人著书立说，正像现代人铸造铜钱一样。古代人是从矿山中开采出铜来，而现代人却靠收买旧铜钱，把它叫作“废铜”，用以充当铸钱的原料罢了。这样做，不仅新铸造出来的铜钱质量粗劣，而且还把古人的传世之宝也给捣碎毁坏了，使它不能流存于后世，岂不是新旧两样钱俱失吗！承蒙您问我《日知录》又写完几卷，如果在您的想像中我是这样高速多产的话，这就是期待我也用“废铜”铸钱了。可是我自别后一年来，尽管从早到晚读书，反复研究探讨，只不过写出十多条。数量虽少，然而却算得上是直接从矿山中采铜吧！

（孙恒年）

正始文学思想的时间断限，上起魏明帝青龙元年（233），下迄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共三十一年。刘勰说：“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塗矣。”（《文心雕龙·论说》）又说：“乃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明诗》）刘勰已经看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但他尚未注意到这种影响在文学思想史上的重大意义。建安时期对文学的非功利特质的认识，止于强调抒发个人情怀，而正始则在抒情基础上，加进哲思，这是对文学非功利特质的进一步拓展；此时文学思想的另一新倾向，是追求玄远情趣，开了以后文学创作中追求淡泊玄远情趣的一派。

1 玄学思潮的形成，原因甚为复杂，此处不具论。玄学问题的探讨开始极早，如蔡邕、曹植均已谈及。正式谈玄，似始于荀粲。而形成一时玄风，则在正始年间，以洛阳为中心，在何晏、邓颺周围，聚集了一批谈玄之士；在夏侯玄周围，也有一个谈玄的圈子；正始中期以后，又有竹林七贤出来，谈玄遂蔚成一时风气，整个名士群体几乎都卷进了玄风之中。

正始年间涉及的玄学理论命题相当广泛，有圣人有情无情问题、本末有无问题、声有无哀乐问题、公私问题、养生问题、言意关系问题等等。这些命题的探讨，有的以谈论的形式进行；有的以著论的形式出现，如何晏的《道德二论》，夏侯玄的《本玄论》，王弼的《周易略例》、《老子指略》，阮籍的老、易二论，嵇康的《养生论》、《声无哀乐论》、《释私论》等等；有的以注疏的形式出现，如何晏的《论语集释》，王弼的《老子注》、《周易注》，向秀的《庄子注》等。这时对玄学命题的探讨，有很高的思辨性，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思维水平。当时士人，有一种强烈的理论兴趣。如果说，建安是一个重感情的时代，那么正始则是一个充满哲思的时期。建安文人，于悲歌慷慨中得到感情的满足；而正始的士子，

则于玄思冥想中领悟人生。

正始玄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建安以来重感情、重欲望、重个性，主张自然任心的思潮发展以来，便常常与名教观念发生冲突。政权中心的主要士人，如何曾、傅玄等人，是坚决反对自然任心的，他们以一种极坚决的态度维护名教。而玄学名士，则肯定自然任性。

在肯定自然任心上，玄学名士又有不同观点。何晏、王弼、向秀等人，有一种统一名教与自然的倾向。这从他们论“有”“无”中可以看出。他们都不否定“有”，但认为这个“有”的本源是“无”，是其自然本性，一切应该顺应自然本性，不要去人为地扭曲、破坏、矫饰它。所以王弼处处讲“因”讲“顺”讲“随”，就是说，讲顺自然之本性。王弼这些观点，在当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用来解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说，名教的存在是现实，是“有”，但是名教的存在应该顺应人的自然本性，不要伪饰。在《论语释疑》中，他解释孝悌与仁义，认为孝悌与仁义都是要的，只要出自内心即可。就是从这一点，他把名教引向了自然。向秀注《庄子》，提出自生自化的“自然”说，在根本倾向上与王弼一样。

嵇康则完全否定名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他每“非汤武而薄周孔”。阮籍也反对名教，但没有嵇康那样彻底。竹林七贤中的其它人，在生活行为上反名教，而理论上则无所发明。

对待名教与自然的不同态度，深刻地影响了其时士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也影响了他们的生活道路。当然，这些也必不可免地反映到文学思想上来。

2 玄风的思想基础是老、庄。老、庄思想既已深入士人生活领域，必也反映到文学创作倾向上。正始文学创作的一个新倾向，便是在作品中表现老、庄的人生境界。

在此之前，诗歌中唯一表现老、庄思想的是仲长统的《见志诗》；在赋中，老、庄主题前此也有出现，如扬雄《太玄赋》；班固《幽通赋》有齐死生与祸福的思想；张衡《思立赋》也杂糅老子与

儒家。但自《太玄赋》至正始，二百五十余年目前看到的有老、庄思想之赋，亦仅此数篇，并未形成一种创作倾向。

正始就不同了，老、庄主题大量出现。稍早，有刘劭的《七华》。何晏《言志》，嵇喜《答嵇康诗》，都表现了庄子思想。何晏和嵇喜，都是入世甚深的人，他们内心深处，却潜藏着逍遥游思想，他们的诗留下来的太少，不然当可窥测其时诗歌创作中老、庄主题的全貌。

这时在文学作品里表现老、庄人生境界的代表人物是阮籍和嵇康。阮籍作品，常常表现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逍遥世界。《清虚赋》写一个无所系念、不受世俗羁缚、精神可以自由驰骋而又恍惚飘渺的天地。他写遨游天上，与神女遇，是要写一种与道冥一、超脱于世俗之外的心境。《大人先生传》也写这个境界：“佩日月而舒光兮，登徜徉而上浮，压前进于彼道兮，将步足乎虚舟。扫紫宫而陈席兮，坐帝室而忽会酬。……召大幽之玉女兮，接上王之美人。体云气之道畅兮，服太清之淑贞，合欢情而微授兮，光艳溢其若神，……时暖曦其将逝兮，风飘飏而振衣，云气解而雾离兮，霏奔散而永归。心惆怅而遥思兮，眇回目而弗睇。”他醉心于这样的神游，在《达庄论》、《答伏羲书》中也都有这种描写。在中国文学史上，前此还没有任何一位作者如此反复地神往于这样一个与道冥一的精神境界，阮籍是把庄子的纯哲理的人生理想境界搬到文学创作中来了。不过阮籍所追求的这个境界是无法实现的，带着虚幻的性质，只能作为现实苦闷中的精神慰藉、精神平衡出现。

嵇康在作品里所表现的庄子的人生境界，不像阮籍那样飘渺空灵，他把庄子的逍遥于无何有之乡的纯哲理的人生境界，变成一首生活的诗。他是第一个把庄子诗化的人。“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琴诗自乐，远游可珍，含道独往，弃智遗身。”（《送兄入军诗》）“流咏兰池，和声激朗。操缦清商，游心大象。”“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微啸清风，鼓楫容裔。放棹投

竿，优游卒岁。”（《酒会诗》）在这些诗里，他所向往的是闲适容与、不受羁缚，没有俗务牵身的生活，这与他主张的“抱琴行吟，弋钓草野”，“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浊酒一杯，弹琴一曲”的生活一样，既有朴素的亲情，又与自然相亲，返归自然。

阮籍和嵇康，把老、庄的人生境界带进文学，就为文学中表现自然、表现人与自然的亲和感、表现对于自然的美的追寻开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中国士人自觉的山水意识起源较早。东汉末年郭泰有养生山林的思想；李膺家于阳城，悦山乐水；仲长统写《乐志论》，也反映出明显的山水审美意识。但是，他们都没有把这种山水意识建立在老、庄人生境界之上；而只有在这种人生境界之上，才能完全摆脱功利的目的，达到山水审美的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始时期才是山水诗思想的滥觞时期。

### 3

正始文学思想的一个新发展，便是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哲理化的倾向。

建安诗人亦体认人生哲理，大抵于感喟中体味人生短促而世路无穷而已。正始诗人则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作更深层次上的哲理思索。作为这中间的环节，是应璩的《百一诗》。应璩诗已有议论化的倾向，但就其主调而言，仍属讽喻。写哲理诗的代表，应从何晏算起。《隋志》著录，梁有《何晏集》十卷，录一卷，彦和对何晏哲理诗的评论，实有所据，可惜何晏这方面的诗并没有留下来。从现存作品看，在诗中表现哲思的，主要是嵇康、阮籍和他们周围的一些人。郭遐周、郭遐叔的《赠嵇康诗》都有老、庄思想。“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譬彼造化，抗无涯畔。”上两句直接引自《老子》，下两句则出自《庄子·人间世》；“何必相啁濡，江海自可容”，则是用《庄子·大宗师》典。阮侃《答嵇康诗二首》，亦多用《老》《庄》。嵇康的哲理诗，已经写得很完整了，如六言《智慧用有为》：“为法滋章寇生，纷然相召不停。大人玄寂无声，镇之以静自正。”即是取义于《老子》“以正治国。……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主旨是“智慧用，有大伪”。嵇康《送兄入军诗》之十九，亦充满哲思。但是嵇

康诗的哲思，大抵引自《老》《庄》，并未作更深层次的思索。阮籍就不同了，他的《咏怀》，旨趣渊深，中实有甚深之哲理，然此种哲理，与抒情相纠结，隐藏于抒情与意象之中，是一种全新的哲思诗。

以《咏怀》之四十六、之四十七、之四十八为例，这三首诗都表现了阮籍在内心极度苦闷之后，自安于退屈的心绪。他有一个无法实现的逍遥游的理想，又面对险恶的政治环境，终日如临深履薄。幻想的失落，也就从自视高远回落到现实中来，自甘退屈。这三首诗，都用了两种意象：鸞鹄，海鸟；燕雀，鸣鹤；鸣鹄，焦明。用两种意象，比喻两种理想的选择，诗意是十分明白的。在写法上，并非以哲理的形式出现。但是细味诗的内蕴，则可体味到一重浓重哲思贯注其间，即委运任化的思想。意在说明，人为是没有好结果的，一切都应任其自然，为大鹏翔于寥廓既不可能，为燕雀而栖于林间亦自得其乐，物固无大小，无彼此，无是非，万物一体，万物齐一，则又何必强燕雀以为大鹏！这种思想，阮籍在《达庄论》中也充分表述过。这三首诗中表现的老子的任自然和庄子的齐万物的思想，正是阮籍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用这一思想，解开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造成的使他苦闷的情感之结。

正始时期诗歌中的哲思倾向，可看作后来玄言诗的滥觞，也对后代咏怀诗的议论化倾向产生巨大影响。

正始文学思想的又一特点，是进一步追求美文学的技

#### 4 巧。

玄言的高度思辨似与美文相抵牾，其实不然。正始玄风承继老、庄传统，高度思辨与直观把握、审美判断是统一在一种思潮里的。玄谈的一个特色，便是心悟，心悟带有直观体认的性质。玄谈也时时带有审美的意味。反映到文学创作倾向上，便是玄理与美文同在。最为突出的表现，便是骈体文在这时得到了明显的发展。应璩书信，几乎篇篇都有十分优美的骈体。阮籍《答伏义书》，几乎通篇骈句，而且以骈句谈玄。何晏《无名论》亦然：“夏日为阳，而夕夜远与冬日共为阴；冬日为阴，而朝昼远与夏日同为

阳。”王弼著作中骈句比比皆是：“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夫道也者，取乎万物之所由也；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等等。《老子指略》中骈句几占一半以上，这在说理文章中是极少有的。王弼以骈句写玄理文章，可以看作后来刘勰以骈文写《文心雕龙》的先导。嵇康说理文章，十分注意节奏，有时虽非骈句，而读来仍有很强的节奏感，《养生论》、《答难养生论》等篇都是例子。与王弼不同的，是节奏感之外，词语更带文学的意味。以骈句写玄理文章，给玄理文带来可读性，这或者是玄理与美文并存的一种特殊形式。

玄理与美文同时存在的另一种表现，便是高度的思辨与空灵的想象巧妙的结合。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是阮籍。他的《清思赋》、《大人先生传》、《达庄论》诸作，内含玄理而发想无端，在思路衔接上，大多是高度思辨的跳跃式结构。这种高度思辨的跳跃式结构与想象的形象描写结合，便造成了阮籍文字的空灵飘忽感。

阮籍在美文的发展过程中还有另一个巨大的贡献：他把诗的表现领域拓宽了。例如，他采用一种泛化的喻示，使诗具有多义性。他的许多《咏怀》诗都如此，以之六为例：“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祸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此诗所指为何？向来解者纷纷。或谓为曹爽之沉溺于荣华富贵而作，或谓泛讥趋权附势者，或谓喻己之不能终隐。这三种解释，都可以找到一定根据。曹爽受魏明帝遗诏辅少主，都督中外诸军事，在与司马懿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曾经喧赫一时，后来司马懿制造了一个高平陵事件，把他杀了。阮籍这诗，可看作对曹爽将败的预言，也可看作对曹爽败亡的慨叹。但是，作为一般的讥讽时事之作也未尝不可，言瓜以其味美，故招来宾客，人以其财多，故招来祸害。至于谓喻己之不能终隐一说，则是以阮籍之心态解“膏火”四句，亦无不可。籍既依违避就于司马氏，又向往于逍遥游，苦闷矛盾，难以排遣，发出“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之感喟，正在情理之中。当然这三种解释，又都并非确证，都可以对之提出非